

上 编

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哲学思考

一、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只要人类社会的运行没有终止，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同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理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的论题，可以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主题”。唯其如此，中外先哲们曾对这个切关宏旨的问题作过深沉的思考。如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见解，便显示出高度的智慧，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向自然界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的过程中，自然界的铁腕也日益强劲地回敬人类。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加深切地引起人们的注目。

然而由于政治和历史等原因，几十年来，我国学术正面论述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这一主题的著述却寥若晨星，人们很不愿意涉及这一“敏感而易引起误会”的论题，究其原因，显然是有一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在近旁，使欲论者望而却步。

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失误，究其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忽视国情实际，而地理环境正是国情实际中的重要层面。从现代化的事业计，从学科的发展计，从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计，深入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一课题，已提到了地理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再也容不得我们回避。

1、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与舞台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载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与舞台。人类历史的进程不能脱离人类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特定的地理条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地理环境之中进行，并与之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正是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才在地理环境这一舞台上演出一幕幕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异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活剧”。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已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认识。

以古人类的诞生而论，没有热带、亚热带丛林，没有第四纪冰期的降临，没有自然环境适度的变化，生物进化史上就不会产生“人猿相揖别”这一质的飞跃；以古文明的产生而论，通过对东方文明史的追溯与对比，可以惊人地发现，四大文明古国的产生与兴盛均具有两个基本的地理条件：一是位于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因这种气候对社会文明的滋生有着刺激作用；二是地处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因这里的土壤疏松肥沃，灌溉便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有利于农耕。同时，这种具有一定生存威胁但又可以用人们当时的能力予以改造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人们在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结成浩荡的劳动大军，形成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力并促进国家的产生。再就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论，澳大利亚之所以被称为“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里的国家”，日本之所以成为外向型经济强国，瑞士之所以成为“钟表王国”等，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背景的制约与影响。

可见，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空间和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无论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人类社会都须臾不能脱离地理环境这一背景与舞台的影响与制约。

2、地理环境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永恒物质条件与能量前提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的启示，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开放的巨系统，它在发展中为了不断求得自己的相对稳定，总是在相对平衡与不平衡的反复调整中尽量使无序的状态变为有序的状态，或在非平衡态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而一个社会要想不断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稳定地向前发展，就必须不断地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即从环境中输入“负熵流”。如果这种交换与输入受到阻滞，社会的不稳定性（或震荡）就会增强（即“熵值”增大），社会运行将受到影响。如果社会与外界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输入中断，整个社会将会瘫痪乃至瓦解。这种交换与输入既包括人类之间相互进行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交换，也包括从自然界或地理环境中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离开了地理环境，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自然资源及能源，就不可能通过社会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生产资料 and 消费用品；离开了地理环境，人类之间就不可能进行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交换，就不可能从系统外获得科技、文化等信息。而这些依赖于地理环境存在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正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条件之一。

总之，地理环境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永恒的物质条件与能量前提。离开了地理环境，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

展。离开了对地理环境的考虑，任何有关社会发展的种种构想便会沦为痴人说梦或空中楼阁。

3、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成分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从“系统”的角度对生产力的内部机制进行分析，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生产力构成的两个基本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则主要是由地理环境中的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自然要素构成，它们作为劳动的自然对象和劳动资料同劳动者一起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过程——当然也就直接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过程。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的自然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的主体（生产者）都是作为生产力这个母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存在，或者说作为生产力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离开了构成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地理环境，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就不可能对社会生产发生作用，生产力的功能自然也就不能发挥。因此，离开了地理环境就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生产力，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发展。我们据此可以进一步认为，在生产力这个母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性状都直接参与决定生产力的性状，而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地理环境必然也参与决定生产力的性状及发展，并由此在内在机制上深刻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此看来，俄国伟大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的论述与观点是比较科学和比较深刻的，

并不是象一些人所指责的是“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总之，地理环境应是我们在研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时丝毫不应忽视的因素。然而令人遗憾和焦虑的是，至今仍很少人愿意从上述角度去分析和考虑问题，“地理虚无主义”的观点在政界的经济战略决策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还很盛行。

由上述可见，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背景与舞台，物质与能量前提），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生产力的重要成分）。我们认为，只有从这种角度与高度上认识，才可能真正看到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机制，而不是象传统观点那样将其仅仅视为社会发展的次要条件和消极、静止的外因，只起“加速或延缓”的简单作用。

4、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

（1）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从哲学的观点看，量和质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都会不断发生变化，地理环境也不例外。地理环境这一客观事物不仅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地理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具有“因时而异”的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社会发展时把地理环境及其作用看成静止不变或变化极小的，并且加以绝对化。如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性原

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见《斯大林文选》第193页）其实，地理环境是变化的，特别是人类活动作为一种重要因素会引起地理环境的迅速而强烈的变化，而变化了的地理环境又会对社会许多因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地理环境的具体作用也是变化的。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171页）他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性质、方向、范围、速度、复杂程度等是一种可变的東西，它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

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如海洋在古代不仅其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利用，而且成为人类活动的天堑和障碍，严重阻难着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在近代社会，海洋却成为人类索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重要空间，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途，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物质、能量基础。如今大凡临海地区或地处海洋交通要道的岛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都快。如英国由中世纪荒凉的世界边缘变成繁荣的世界贸易、经济中心，日本由历史上落后的封建穷国变为现代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出现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都是临海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作用”的典型例证。过去的农耕文明时代，是具有优越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民族独占鳌头，具有高度适应“农耕文化”地理环境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都曾在这个值得回忆

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杰出的史剧，成为时代的骄子。然而当工业革命的历史帷幕拉开之后，这些农业文明时代的“风流健儿”大多悄悄隐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临海地理环境的西欧、日本等民族粉墨登场，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如我国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后来居上，而黄河中上游地区这一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伍，这些则是不同地理环境动态作用的有力佐证。

由上述可见，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作用，是随着社会历史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或时序性。

(2)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由于地理环境既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又是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而且其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因而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作祟，一些人将此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有的甚至在此问题上故意大做文章，动辄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帽子压人，使人不敢正视和大胆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众所周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或社会生产方式。一般来说，地理环境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对社会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但这是不是说地理环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起决定作用呢？我们认为，对这一复杂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许多因素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自然界中某一现象的产生，社会中某一事物的完成或某一问题的解决，如果其它因素皆存在，而某一因素的存在与否或性状如何，往往可以对该事物的发展或该问题的解决

起着关键性或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决定条件。因此，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是可以起决定作用或关键作用的。

“例如在干旱地区，水源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见胡兆量“地理学的宏观研究方法及其应用”，载《人·自然·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又如，四大文明古国唯独都产生于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大河流域，而不产生于寒带或沙漠地区，地理环境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用地理条件解释社会现象，他们的许多思想都明确肯定过地理环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见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情调查工作委员会编写：《南北春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又如他指出：“资本的母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地方……。”（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54—555页）以上均足以说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不能低估，其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某些决定作用亦不可忽视。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作用方面的区别上。所谓纵向，即指某一区

域的社会发展，或者说同一地域的社会历史在时间轴上的纵向发展，就此而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多是量上的，一般不起质的决定作用；所谓横向，即指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域的历史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运行，或者说在对各地域进行横向比较时，发现它们在时间轴上发展的空间差异，就此而言，地理环境有时在某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可以起关键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如在近代，西欧国家走的是一条商业——工业文明的道路，而东方大多国家却走的是一条农业文明的道路，这显然是由于不同地理环境关键性的制约。从宏观上看，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一般不起决定作用，但从微观上看，地理环境对特定地区或在某时期对某社会事象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地处大洋中交通闭塞的孤岛和热带丛林中，至今仍存在过着蒙昧野蛮生活的原始部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又如近年我国石油勘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至今仍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部落等。“其实，在有些方面，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是一种铁的法则，一条铁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如澳大利亚被誉为‘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里’的国家，畜牧业和采矿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草原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就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见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情调查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南北春秋》，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上述这些都可以说是地理环境在微观上或特定地区起关键性作用的例证和说明。

此外，从地理环境是“物质”、是“存在”这种哲学意义上看，它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乃至消亡提供了物质基础，它决定了地理环境中的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

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它决定了人类一切活动都必须顺应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因此，从这种角度讲，地理环境具有决定作用也不是没有道理。（见葛剑雄，“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影响”，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第53页）而那种一涉及到地理环境影响历史文化的进程和风格，一提到“决定”二字，就被斥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作法，是全然不可取的，乃是斯大林在三、四十年代的苏联造成的一种不良学风。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必要复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既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又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社会历史发展或文化生成的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总之，地理环境的作用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伟力，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而极为复杂的作用，其中有许多问题有待人们去研究，有许多奥秘尚待人们去揭示。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将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常论常新的论题。

二、地理环境与文化的交互影响 及辨证关系

1、文化与文化生态

“文化”一词在拉丁文中为cultura,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和敬神等多种含义,由拉丁文派生出的英文和法文中的文化一词均为culture,并逐渐由耕种、养殖栽培等引申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在英文中,culture可衍生出许多与培育等有关的词语。如农业——agriculture,耕地——culturedfield,蚕丝业——silkculture,(经过人工培养的)珍珠——culturpearls,体育——Physicalculture。由此可见,文化的初始含义,指的是为人类所特有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动,文化一词带有明显的动词词性,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步衍生成为名词。

自从19世纪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与文化有关的学科(如文化地理学等)兴起之后,关于文化的定义便层出不穷。由于文化内涵的不确定和涵盖面太广,人们很难给它拟定一个十分清楚而确切的定义。据《大英百科全书》统计,世界上仅在正式的出版物中给文化所下的定义多达160种。纵观众多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两种。

广义的概念,如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勒认为,文化是指包含知识、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才能和经验在内的整个复合体。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其所撰的《中华文化史》目录中,则包括朝代篇、种族篇、饮食篇、服饰篇、交通篇、宅居篇、通商篇、教育篇和学术

篇等。这是包括了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活动，将文化视作物质与精神文明总和的广义理解。而狭义的理解，则把文化限于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以及艺术等精神领域内。

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文化”的精辟认识。如成文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字，从纹理义演绎而来，

“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古代赋予“文化”的内涵，它已相当接近近现代学术界所揭示的“文化”的本质意蕴——“人类化”、“自然的人化”。

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研究认为，文化是一个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因此很有必要对其本质进行探究。

纵观众多的文化概念，大多缺乏一个明朗的、论证充分的关于文化本质的定义。究其缘故，与近代学术存在的一个弱点有关：即人为地造成主体与客体的割裂或分离，形成“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的两种不良倾向。冯天瑜教授研究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因此，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或简单地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是文化生成的土壤，文化得以运动须臾不可脱离环境。而许多文化观念只强调人类的主体活动，而将主体活动的客观条件——地理环境排斥在文化生

成的机制之外，从而把文化看作是一种主观随意的产物。而坚持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应是研究文化的正确理论基石。

文化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人与环境不断发生交互关系的有生命的机体。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应注重从孕育、滋养文化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入手，探明文化产生的自然前提。这种探究工作可称为“文化生态”考察。近些年来，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新的学科——文化生态学。而文化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致力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研究。

生态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cs”。含义有“住所”、“区住”、“环境”诸意。后来，生物学家用来研究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遂成为一门科学——生态学（ecology）。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也是现实的存在，人类的活动都是以自然界为基础，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它作为一种自然力必然与地理环境发生关系。因此，包括人类所有创造活动的文化，也必然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与自然界或地理环境之间，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通、转换，进行创造活动的态势，我们称之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个复杂的系统，有诸多要素所构成，受诸多要素的影响，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生产力的变化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在人类创造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实践行为，创造出物态和非物态的文化，融合于地理环境之中，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与影响是通过文化的作用而实现

的。可以说，人类的文化越发达，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也越广泛，其影响也越大。但是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单纯接其影响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双向同构”关系。而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地理学要研究的是人通过文化与环境这种双向的作用与影响。

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调适及内在联系。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或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作为文化生态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生态”或“文化背景”，是文化生成的重要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在这本专著中系统探讨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逐一进行分析探讨。

2、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关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关系，冯天瑜教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与背景。并认为地理环境不只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更重要的是，它是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

做为文化研究者，我们在肯定地理环境对文化的重大影响之后，重要的是需要探明地理环境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经由哪些中介作用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弄清地理环

境对文化的作用机制。

人类创造的文化，不是地理环境单独的产物，而是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人文因素的复合体，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形成人类文化的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文化风貌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间接地发挥作用。大家知道，社会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程度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其中生产力又居主导作用。而生产力的要素与地理环境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或深或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基本上是来源于地理环境本身，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物质生产方式构成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中介。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建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文化地理的研究中，对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应给予恰如其当的估量与评价。

这里，我们试以中国为例，具体剖析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①地理环境的整体属性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风貌

王会昌教授研究认为，中国文化的气质是内向型的，风格是和谐型的，内核是伦理型的，这些传统文化风貌的形成，均与我国地理环境的整体属性有密切关系。如由于我国的地理环境为高山、大漠和海洋所包围，在古代显得相对封闭和孤立。但其内部腹地辽阔，资源丰富，因而在无求外助的情况下，独立地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农业文明。这一切，必然使得中国文化的气质具有典型的内向型特征（如“中

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地理观念；内向开拓精神；长城之象征等），从而与流动、开拓的掠夺、冒险的游牧与商业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中国的地理环境较封闭，然而其腹地十分辽阔、完整，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资源丰富多彩，有人把它形容为“外部封闭、内部活跃”。尤其是东部地区，河网密布，沃野千里，季风定期带来丰沛的降水，水热配合良好。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平原上村落密集，男耕女织；江湖上白帆点点，渔歌唱晚……生活在这种优美、和谐、自给自足的土地上的中国人自然不喜欢虚伪、罪恶与丑陋，更不喜欢侵略扩张与动乱。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理想的太平盛世，从而就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和谐风格。这可以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哲学观中见其一斑。由于内向型气质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很少关心外部世界和来世，而十分重视现世，注意人生，注重人际关系。这种和谐风格的文化，又使得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讲究和谐，讲究统一，讲究和睦礼让，重视孝亲，宗法意识浓厚。这种文化的内核属明显的伦理型。

②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影响文化的民族性(或地域特征)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进而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或文化的地域特征。例如，有大河灌溉的亚热带、暖温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优裕的水热条件，故农业最早得到发展（如四大文明古国）；草原地带有流动畜牧的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经济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交通之便和